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马俊亚 著

区域社会经济 与社会生态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013028423

F127
325

大学史学丛书
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刁俊亚 著

区域社会经济 与社会生态



F127
325



北航

C163493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态/马俊亚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167-8

I. ①区… II. ①马…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F127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504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24.5

字 数 390千字

定 价 70.00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藪。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智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棫、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中国近代社会关系整合与工业从业者的属性	1
混合与发展:近代江南社会经济形态辨析	14
江南地区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关系	38
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	55
近代江南地区传统钱业的功能与演变	85
近代无锡传统经济部门的运营与新式工业的发展	114
时空互动:江南与苏北的劳动力循环(1800—1950年)	129
抗战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的衰变	154
从沃土到瘠壤:淮北经济史几个基本问题的再审视	184
被牺牲的“局部”:治水决策与淮北社会转型(1580—1949年)	205
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	229
泗州之沉:国家政策因素与淮北社会生态的衰变(1580—1949年)	249
“河务习气”:清代官场政治与淮北的治水成效	263
从武松到盗跖: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	276
近代淮北地主的领主化	
——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297
两淮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年)	
——国家机器的自利化	322
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年)	

——商人集团的寻租活动	337
国家服务调配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	
——评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 济(1853—1937)》	360
后记	384

中国近代社会关系整合与工业从业者的属性

从1840年至1949年这100余年里,中国各种社会关系始终处于剧烈的整合之中,近代社会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被古代世界所纠结缠绕。工业从业者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特有的新型集团,既是工业文明的结晶,又带有古代世界的烙印。本文从工业从业者与古代世界的关系入手,考察中国近代工业从业者的真正属性。

一

中国近代工业从业者在物质形态上与古代世界最明显的联系,就是对农村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对土地的兼营。其中,资本家阶级占有土地,历来为学者们诟责,被视为其“封建性”的最有力证据。

近代资本家占有土地确实普遍。汪敬虞先生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列举的7例资本家占有的土地数量,均在数百亩以上,有的多达数万亩。^①近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无锡地区,绝大部分资本家占有土地。经营庆丰纱厂等企业的唐保谦家族有土地6000余亩,五金业、丝业资本家周舜卿一次即购土地千亩,经营业勤纱厂等企业的杨宗濂家族拥有义田数百亩,无锡礼社薛家土改时仍有土地近2万亩,经营振新纱厂的荣氏家族拥有义田300亩。^②这些大资本家占有的土地,多是在他们投资工业前,经其家族数代人积累起来的,随着各自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是逐渐缩小,而不是逐步扩大。如礼社薛氏家族投资工业前占有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019—1023页。

② 本厂编史组:《无锡第二棉纺厂厂史》,油印本,第1—3页;周承恩等撰:《〈周舜卿〉行述》,无锡政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藏抄件;汪敬虞前书,第1020—1021页;中共苏南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内刊本,第483页;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第一集:《第四区》,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1931年,第77页。

的土地为4万亩,荣氏义庄后则改为新式学校。中小资本家同样占有土地,据土改时调查,无锡杨北乡济南等7个小村的20户中小资本家,户户有土地,累计达158.084亩。一份报告称:“无锡为苏南主要工业城市,工商家在四郊占有土地为数颇多。如南门铁业公司占有土地三四十亩,茂兴公司有土地四十多亩,北郊启新纱厂有土地三十多亩,华新纱厂有桑田二百余亩,这些土地有的是准备用来建厂的,但目前大多租给农民或雇人耕种。”^①

把资本家占有土地的现象,无条件地视为封建性的表现,显得过于简单。

首先,工业资本家一般把土地创收与工业经营结合起来,在工业企业大获其利时,利用工业盈利进行土地投资;而在工业企业面临资金困境时,再将土地积累挹注工业企业。

1905年,无锡振新纱厂创办时,荣氏宗族族长荣福龄“深感土地收取的租金已不敷义庄开支,因此,把用义庄名义募集的资金入股于振新纺织公司,靠股金红利收入来维护和发展新义庄”。^②振新纱厂创办后,荣福龄出任董事长,“在振新纱厂发生危机时,荣福龄把新义庄基金转为振新股票,而在振新经营好转时,又把振新股票溢价交换为新义庄基金,用以建造校舍和养老院,并把新义庄基金投资于新兴实业”。^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商业需款极切,那些与工商业有联系的土地占有者纷纷把土地积累投向工商业。研究无锡近代经济史的学者指出:“20年代以后……有些地主(此处应为资本家兼地主。——引者注)已经把地租积累转移到工商业的投资方面去。无锡城中的杨氏、薛氏和严家桥的唐氏固然早已是这样做法,就是荡口的华氏、北乡斗山的吴氏也都投资兴办近代工业。”^④

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工业资本家保留对土地的兼营,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供应,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利润升降莫测,而土地收入则“丰年不增、荒年不减”,^⑤即如亚当·斯密所说:“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与商人资本比较,他的财产不易遭遇意外。”^⑥经营工业企业对知识、精力要求颇高,从土地获取收入

①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2年,第166—168页。

② 荣敬本等:《梁溪荣氏家族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③ 荣敬本等:《梁溪荣氏家族史》,第54页。

④ 王赓唐、汤可可:《无锡近代经济史》,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

⑤ 欧阳惠林:《苏南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402,案卷号64,文件号7。

⑥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6页。

则无此要求,工业资本家将工业经营与土地创收相结合,实为精明之举,“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①从而使工业企业更能抵御风险。

其次,土地可为企业押进大量资金,使企业获得意外的经营效果。

随着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把对人信用改为对物信用,企业通过物品抵押,可以获得凭个人信誉难以得到的巨额借贷资金,而田单地契是银钱业最为信赖的押品。一方面,银钱业收押田单既无须存贮,更无腐烂耗败等风险。另一方面,工业资本家把田单交银行作押时,不会影响其土地收入,更不会像抵押机器原料那样,影响企业经营。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无锡、南通先行地价申报,组织者认为首要益处即是:“若举行地价申报,则业主凭合法手续取得政府之地价申报证明书,上载有业主姓名、亩数、地价等,有志经营工商业者,即可持此证,向人抵押借款,不啻一种有价证券,市面金融赖以流通。”^②

用土地作抵为企业贷借资本,常能使企业走出困境,即使在普遍危机时期,也可使企业享有厚利。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部分丝厂因资金短缺而倒闭,“仅[薛南溟家族的]永泰和少数厂尚能维持……1932年春茧收茧时,开秤茧行很少,茧价惨跌至每担20余元,但丝市即有回升,永泰即以厂基和薛家田单等向银钱业押款,乘机在无锡、溧阳、湖州、嘉兴、常州、宜兴等地,低价收茧,继续开工,利润独好”。^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这次危机中也以大量地产向银钱业押款,逐渐摆脱困境,据申新总公司档案,仅1933年—1934年,荣家即以550余亩地产向银钱业押款百万余元挹注申新系统。^④

以土地作抵借入资金,与出卖土地投资工业企业具有相同的意义。马克思引用詹·威·吉尔巴特的话指出:“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汇票贴现形式贷给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100镑,那和他把这宗商品出售而取得100镑汇票,并把这张汇票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2页。

② 阮阴槐:《无锡土地整理》(二),中国地政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6种,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等,1977年,第17905页。

③ 无锡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永泰丝厂史料片断》,《无锡文史资料》第2辑,第67页。

④ 申新总公司档案,总公司流水第1号,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抄件:《〈申新〉总公司抵押借款及抵押品表》。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7页。

工商业资本家经营土地的现象,绝非近代中国仅有。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写道:“资本主义或城市的金钱(来自贵族和资产者)很早便开始进入乡村生活。欧洲没有一个城市的金钱不向邻近的土地漫溢。”^①列宁指出:近代俄国,“富裕农民既把资本投入农业(购买土地、租地、雇佣工人、改良农具等),也投入工业企业、商业和高利贷:商业资本和企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②列宁写道,农村的富裕户“把工商企业同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结合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正是这种‘副业’对俄国‘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最典型的”。^③这不但不是什么封建性的表现,而且“只有这少数的殷实户才能稳定地参加‘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④

有人认为,中国资本家阶级天生具有保守性,因而多投资土地;西方资本家天生具有开拓性,因而很少投资土地。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近代欧洲商人中间就流行一句谚语:“土地不会使人上当。”佛罗伦萨的商人在一封信中写道:“买地至少不会冒海上的风险,不会像商业公司那样蒙受诈骗,更无破产之虞。”^⑤由此可见,不论中国还是欧洲,资产者避险趋稳的心态是一致的,并非中国资产者所独有。

有的学者则常把资本家的土地投资视为与高利贷剥削同等落后,这是不公正的。列宁就把富裕农民的土地投资视为与企业投资同样进步的生产性投资。他指出:“在俄国村社农村中,资本的作用不限于盘剥和高利贷,资本也投入生产,这可以从下列情况中看出来:富裕农民不仅把钱投入商业企业(……),而且还用来改善经营,购买土地和租佃土地,改良农具和牲畜,雇用工人等等……从小商业和高利贷中排挤出来的富裕农民的资本,将更大规模地投入它现在已经开始投入的生产。”^⑥实际上,社会资金即使不流向土地,也未必会转向工业,20世纪30年代,中国货币拥有者不再热衷于购田置地,而是携资躲入沿海大中城市,导致都市金融畸形膨胀,不但没有促进工业大发展,反而使工业与农业同样处于衰落境地,且尤以对农村社会打击为大。可见,资本家对土地的兼营,确应属于生产性经营,资本家与土地的联系不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障碍。仅凭这种联系就断言中国资

①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卷,第119页。

④ 《列宁全集》第3卷,第120页。

⑤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57页。

⑥ 《列宁全集》第3卷,第157—158页。

本家阶级天生具有封建性,是非常皮相的。

二

与资本家阶级相似,中国近代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同样没有斩断与农村社会的联系,他们同样占有土地。与对资本家大加挞伐相反,学者们多对工人占有土地的现象有意掩盖,或置之不提。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 世纪 60 年代编辑的《荣家企业史料》提供了 14 名工人示例,其中,5 名工人家中自有田地 2—6 亩,占抽样总数的 35.7%;8 名工人家中自有或佃种田地数亩至十余亩,占抽样总数的 57.1%。^①据土改前的调查,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苏南地区的出租土地:“虽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但亦有为城市工人、小贩占有。”^②作为苏南典型的无锡坊前乡,按全乡人均使用土地面积计算,工人为 0.590 亩,超过了雇农(0.380 亩)、职员(0.518 亩)、小商人(0.410 亩)、工商业家(0.280 亩)、手工业者(0.440 亩);低于地主(0.844 亩)、中农(1.630 亩)、富农(2.364 亩)、贫农(1.010 亩)、自由职业者(0.650 亩)。在该乡出租田地各阶层中,工人共出租土地 34.58 亩,超过了富农(18.12 亩)、贫农(17.12 亩)、手工业者(7.81 亩)、小商人(27.04 亩);低于地主(618.00 亩)、中农(92.77 亩)、工商业家(128.26 亩)、职员(65.67 亩)。^③

苏南地区普遍存在中小土地出租户,出租土地数量约占土地出租总量的 10% 左右,^④在这些中小土地出租者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工人,如无锡县荣巷镇附近的小丁巷、郑巷、杨木桥等 6 村中小土地出租者中,8 户家庭主劳力在外当煤炭工人、煤气工人、雇员等。^⑤

近代中国另一工业中心南通地区,“其工人大多是尚未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进厂以后,家里仍然种田”。^⑥据对大生纱厂工人的访问,被访工人谈到曾参加农业或家庭手工纺织劳动的共 92 人,其中,种 1—2 亩田者 11 人,种 2.6—3.2 亩田者 6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119—122 页。

②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 166 页。

③ 中共苏南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324 页。

④ 中共苏南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377 页。

⑤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68 页。

⑥ 穆烜、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00 页。

人,种4—5亩田者7人,种6—7亩田者3人,种8—10亩田者5人,有田者占总人数的34.8%。^①

马克思指出:工人失去生产资料、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②出于对马克思这段话的机械理解,我们一向认为中国的工人来自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实际上,不论是抽样调查,还是全面统计,都证明相当一部分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工人占有土地的现象,也并非近代中国特例。列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有份地的农村工人。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这种农村工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英国的茅舍农民(cottager)不是法国或莱茵各省的小块土地农民,而后者又不是普鲁士的贫农和雇农。每一种农村工人都带有特殊的土地制度痕迹,即特殊的土地关系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把他们概括为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类型。”^③

马克思晚年同样注意到各个阶级之间的模糊性。他指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④

基于对马克思理论的准确把握,列宁把“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视为“新型的农村居民”,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中固然有完全无地的农民,“然而,最典型的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或其他工人”。^⑤列宁批判对马克思理论的机械理解,指出:“人们常常过于死板地理解下面这个理论原理,即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地的工人。作为基本趋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本主义渗

① 穆烜、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第2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卷,第1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0页。

⑤ 《列宁全集》第3卷,第150页。

入农业特别缓慢,其形式非常繁多。”^①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占有土地的中国近代工人同样属于无产阶级行列。

我国向来有一种极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自破产的农民,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天然地与农民融合在一起。这个观点既经不起理论推敲,也经不起事实检验。

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②可见,在大工业时代,雇佣工人和农民是新旧根本对立的阶级。在马克思看来,与小土地所有制相适应的农民属于“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于社会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国家的一切痛苦和穷困”。^③工人则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也就是说,工人与农民是两种新、旧完全不同的文明的产物和代表,它们如何能天然地融合在一起呢?

列宁说得更为明白:在资本主义初期,手工业者就瞧不起带有宗法式的村野习气的“愚昧的”农民,“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小手工业中,这种现象表现得还很微弱……在资本主义工业的以后各个发展阶段……这种现象会大量出现”。^④列宁写道:“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做‘牧人’(雅罗斯拉夫里省),‘哥萨克’(弗拉基米尔省),‘种地人’(莫斯科省)。”^⑤

列宁多次引用当时的调查报告描述各地工人与农民的距离。如卡通基村,“当地居民性格的某些特点,同俄罗斯已经形成的‘工厂人’完全一样……在庄稼人面前态度有些傲慢,——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以及所有俄国工厂人的共同特点”;^⑥博戈茨科耶,“居民一点也不像一般愚昧的农夫:他们……轻视农民”;^⑦阿尔扎马斯,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1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7页。

④ 《列宁全集》第3卷,第335页。

⑤ 《列宁全集》第3卷,第239页。

⑥ 《列宁全集》第3卷,第366页。

⑦ 《列宁全集》第3卷,第365页。

居民几乎都不从事农业,当地人“轻视从事农业的农民,把他们叫做‘乡下佬’”。^①

近代中国与列宁描述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李景汉 20 世纪 30 年代对定县的调查,该县外出做铁路包工、差役、店主、煤矿工人等职业的人皆“不愿做农”。^②同时代的无锡地区:“迩岁强壮农民,颇多抛离乡村,群趋城市或上海,舍农就工”。^③农民大量离乡,整个中国“为工作斗争是如此的剧烈”,^④难怪受城市工业文明熏陶的工人会瞧不起“乡下人”。费孝通先生极为形象地写道:“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按喇叭,慌了手脚……汽车夫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口:‘笨蛋’。”^⑤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对“乡下人”的鄙视和嘲笑,已成近代一大社会问题。中国工人不但对纯粹的农民瞧不起,而且对那些由农民向工人转化较迟些的工人也瞧不起,甚至百般欺侮。据原南通大生纱厂工人陈金凤回忆:“11 岁进厂做工。进厂前,一家四口人种的是租种田……我在车弄子的中间做,两头的老手[老工人]不让我走,经常把尿弄在身上……有些老手太欺人了,她们捉了虱子放在我头上。换纱换不到,就站在车档子上换。经常被老手推,一推就跌了下来。”^⑥

优于乡村农业文明的城市工业文明,对于乡村移民的影响和诱惑至深至大,乡村移民接触城市文明后,普遍感到无法重新回到原来不太文明的生活环境中。费孝通所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⑦的现象,具有普遍意义。这种现象与俄国农村居民“无意之中就模仿圣彼得堡人的外表与习惯”何其相似,正说明了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可见,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可天然融为一体的说法似难成立。我们认为中国工人的进步性恰恰应与俄国工人阶级相似,即表现在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发展程度”,“较高的识字率,高得多的需求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同‘土里土气

①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367 页。

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 年,第 42 表(第 162—165 页)。

③ 无锡县政府编:《无锡概览》,无锡:文新印刷所,1935 年,第 1 页。

④ 马扎亚尔:《中国经济大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 年,第 93 页。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9 年,第 8 页。

⑥ 穆烜、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第 14—15 页。

⑦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 年,第 72 页。

的‘乡下佬’的迥然不同。”^①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人的进步性表现在与大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各项素质上，而不是停留在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水平上。

三

中国近代工业从业者在物质形态上与古代世界的联系，并不表明他们天然地带有封建性；相反，他们在精神意识方面与古代世界的联系，却是他们不成熟的真正体现，亦即真正的封建落后性。

在近代中国，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工人在市场上相遇，尽管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他们却无法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

中国近代工厂的通例，工人一般由工头招收。如上海福新面粉系统，“各部门的工人都由工头分别统治，该部门工头是哪里人，工人也都是哪里人，形成帮派”。在福新一厂、七厂，面粉间大部分是宁波人，打包间是无锡、常州人，下麦、外场则为苏北人；福新二厂、八厂主要为湖北人。^②一个地区帮派站住脚后，其他籍贯的工人很难加入。在上海，即使同籍工人也要通过拜“老头子”才能进去做工；^③上海纱厂中，“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信仰关公”。^④在北京等地，“工人须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接主、工头或组长。其中若干作为工作取得权的贿赂费……这项仲金从1900年到1925年在北京从全部工资的4%增到10%……在无锡，建筑工人须把自己工资的10%付给接主”。^⑤一些权势较大的工头，手下网有打手，往往控制十数家企业工人的使用权，^⑥他们不但垄断劳动力卖方市场，就是作为劳动力买方市场的资本家阶级也受其操纵。著名资本家荣德生在1948年写道：“茂一复业后……复有一班无赖之辈依藉背景，要求入厂工作，不顾正理，一味胡搞，无法应付。”^⑦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394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35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35—136页。

④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页。

⑤ 马扎亚尔：《中国经济大纲》，第93页。

⑥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35页。

⑦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江南大学1990年打印本，“1948年”纪事。